

當代中國的回憶錄書寫 與歷史記憶的建構

●唐小兵

近二十年來，回憶錄成為當代中國文化界、出版界極為令人矚目的一種書寫主題，尤其是關於二十世紀中國的回憶錄，受到一般讀者和專業學者的普遍歡迎，成為學術界與讀者群都高度重視的一種思想文化與歷史資源。回憶錄是否可信？它們是否能夠作為一種可信史料被歷史學家直接引用？回憶錄能否呈現出一種多元的歷史記憶和歷史論述的競爭？不同的社會文化身份主導下的回憶錄寫作，是否可以推進對二十世紀中國的多層次、多側面和多視角認知？浩如煙海的回憶錄，是否有力地挑戰了由政治意識形態或者主流價值觀主導的認知框架，從而深化當代中國人對於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認知？庶民的、女性的、底層的、邊緣人群的、外部的視角在回憶錄的撰寫與出版中扮演怎樣的文化角色？

台灣中央研究院院士王明珂曾經指出^①：

歷史不只有一種聲音；許多不同時代、不同的社會人群，都在爭着述說自己的過去，爭着將自己的過去一般

化、普遍化，以成為當代的社會記憶，以抹煞他人的記憶。在自傳、傳記與口述歷史中，我們可以看見，有些人可以向社會宣揚自己的過去，有些人的過去被社會刻意發掘、重建。這是對過去的詮釋權之爭，也是認同之爭，權力之爭。

我們需要追問的是，在這種歷史記憶的「認同之爭」與「權力之爭」中，能否形成某種最低限度的重疊共識，進而為二十世紀中國的認知框架提供一個基本的知識基礎？回憶錄的寫作、出版、傳播與閱讀，如果只是增加了一些社會人士的談資，或者強化了某個人或某個階層固有的偏見，進而撕裂當代中國社會，那麼回憶錄在公共文化領域與歷史研究領域的價值又該如何評判？

與記憶相對應的是遺忘，羅新曾經指出一個社會公共記憶中的遺忘奧秘，他如此寫道^②：

在政治權力高度集中、國家對社會具有壓倒性優勢的文化—政治體，歷史敘述的競爭主要體現為政治權力要排

斥一切不利於或無助於政治權力的歷史敘述，從而使服務於政治權力的歷史敘述獲得獨尊地位。……官修正史代表王朝的政治立場和利益判斷，不符合王朝利益的往事為正史所屏蔽，因而也就為社會所遺忘。遺忘研究已經指出，要實現遺忘，不僅可以通過緘默，而且可以通過喧嘩。全社會對一個事件的緘默不語固然會造成該事件徹底從記憶中消失，而全社會熱議與該事件相關的其他事項卻完全不提該事件本身，同樣會造成該事件的遺失。

就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記憶而言，我們同樣可以窺見靜默與喧嘩的對照。對於那些讓中國人創深痛鉅的歷史記憶，官方會採取各種方式來系統地修改、清除或者改頭換面，而對有利於強化政權合法性的部分，則會通過媒體、學校和社會教育等各種形式塑造一邊倒的「歷史記憶」。就此而言，通過對於多元的回憶錄的梳理來重構一種無限逼近歷史真相的個體記憶和集體記憶，就顯得尤為必要和重要。就我閱讀和寫作所見，有關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近些年來出版的比較有史料價值和文化意義的回憶錄不下上百種，我只能選擇一些有代表性的回憶錄（包括部分口述自傳、訪談）來展開梳理與論述。

一 以身份區分

以回憶錄作者的社會文化身份來區分，可以分為政治人物、學者、報人、社會名流、普通人等類別。

（一）政治人物

政治人物是二十世紀中國歷史最重要的變革者和見證人，他們的回憶

錄往往包含豐富的歷史信息與文化內涵，成為研究政治史、外交史和社會文化史等非常重要的史料來源。比如《顏惠慶自傳》（1973）、《顧維鈞回憶錄》（1983-1994）等，就細緻地記錄了清末民初中國最初的一代職業外交官員在內政外務方面的工作與見聞，這些回憶錄對拓展民國外交史的研究領域與深度較有意義^③。

內政與軍事方面的回憶錄，比如黃紹竑回憶錄《五十回憶》（1945）、《陳布雷回憶錄》（1949）、《李宗仁回憶錄》（1980）、《陳誠先生回憶錄》（2004-2012）、《張學良口述歷史》（2007）、《海桑集：熊式輝回憶錄，1907-1949》（2008）等，與1990年代以來陸續出版的民國政界人物的日記（比如《王世杰日記》[1990]、《在蔣介石身邊八年：侍從室高級幕僚唐縱日記》[1991]、《王子壯日記》[2001]、《陳克文日記：1937-1952》[2012]等）可以彼此證實或證偽，呈現民國時期政治場域複雜的權力鬥爭與人事糾葛。例如，《李宗仁回憶錄》裏就重點談及李宗仁指揮台兒莊戰役獲勝的前因後果，凸顯了桂系將領與蔣介石的嫡系軍隊在中國抗日戰爭中的貌合神離關係。此外，中國大百科全書出版社於2009年出版的從台灣、香港引入的整套「回憶錄叢書」，包括《曹汝霖一生之回憶》（1966）、《潮流與點滴：陶希聖回憶錄》（1979）、《高宗武回憶錄》（2008）等，也具有較高的史料價值，有助於史學研究者觀察與分析北洋政治人物、汪精衛政權的核心人物以及中國青年黨的領袖等。

（二）學者

在各類回憶錄中，以學者的學術和日常生活為主題並且大多由學者親自撰寫的書籍佔較高的比例。學者是

一個時代的知識與文化精英，往往對時代的鉅變與內中的曲折有敏銳的感知和深刻的洞見，其中一部分人甚至或多或少參與了社會和文化的轉型過程，因此他們的回憶錄大都具有明確的史料自覺與文化意識。這方面比較有社會文化影響力的是何炳棣的《讀史閱世六十年》(2004)和何兆武的《上學記》(2006)。*《讀史閱世六十年》*的前半部分纖毫畢現地再現了作者的少時經歷、讀書生活以及在國內短暫的工作經驗，詳述民國時期清華大學尤其是歷史系的風氣、人才培養方式和知識體系等，書中所記載的清華學生運動，對歷史學家了解1930年代尤其是1935年「一二·九」學運時期中國共產黨與學運之間複雜的關係，以及大學生群體對待政治紛爭的不同態度大有裨益。而*《上學記》*有助於了解抗戰時期西南聯大的學風、校園政治與文化形態，以及這所精英大學與雲南地方社會之間的關係。何兆武先生去世後由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上學記》*姊妹篇*《上班記》*(2022)記錄的則主要是毛澤東時代的社會、政治與文化生活，具體而微地呈現了一個反智主義的荒誕時代是如何煉成的。

同樣出身於清華政治系的蕭公權的*《問學諫往錄》*(1972)和浦薛鳳的*《浦薛鳳回憶錄》*(2009)，對於了解民國時期的社會文化歷史、城鄉之間的知識人流動以及高等學府的機構設置、人才培養，乃至學術與政治的關係，都有一定價值。近年出版的湯一介撰寫的*《我們三代人》*(2015)和章開沅口述自傳*《章開沅口述自傳》*(2015)縷述了從民國到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教育與社會轉型，為這些課題提供了一手的觀察材料。台灣允晨文化實業股份有限公司出版的*《余英時回憶錄》*(2018)以傳

主的學思歷程為線索，講述了余英時先生從幼年時期在安徽的鄉居生活、到後來抗戰勝利返回北平等城市的求學生活，以及在香港新亞書院和美國哈佛大學的學術生涯，尤其對1950年代香港各種民間報刊和政治思潮做了極為細緻和深入的分析，對於研究這個時段的海外流亡知識人的生命世界與精神世界極有參考意義。

(三) 報人

晚清、民國的報人(包括記者與主筆等)是一群現代意義上的新式知識人，他們因為職業的特徵和工作需要而與政界、商界、軍界和學界等多有接觸，可以說是大時代最重要的見證人與觀察者。因此，這群報人的回憶錄史料價值往往極為豐富多元，涵括民國的各個側面。比較值得關注的有*《在出版界二十年——張靜廬自傳》*(1938)、包天笑的*《鈞影樓回憶錄》*(1971)、*《董顯光自傳：一個中國農夫的自述》*(1973)、*《曾虛白自傳》*(1988-1990)、*《陸鏗回憶與懺悔錄》*(1997)、*《徐鑄成回憶錄》*(1998)、陶菊隱的*《記者生活三十年：親歷民國重大事件》*(2005)等。這些回憶錄具有雙重的史料價值：一方面，它們記錄了民國和當代中國政治、社會與文化，尤其是對推進上海的社會文化史研究較有意義；另一方面，它們也為民國報刊出版業集中保留了相關史料，有助於歷史學家了解和研究這個特殊的新職業群體的形成與轉型歷史。

(四) 社會名流

社會名流往往是一個時代的風向標，他們享有崇高的社會地位與稀缺的象徵資本，因其社會精英的位置，與社會中核心的政治與文化權力容易發生關聯，所以這一群體的回憶錄也

是值得重視的。就經濟社會史而言，女性企業家董竹君的《我的一個世紀》(1997)記述了從幼時的苦難到逃出「魔窟」(青樓)、求學日本，再到回國後的婚姻不幸以及創業艱辛等生活史，從女性的視角再現了這位上海錦江飯店創辦人不平凡的一生。民國名流陳存仁的《銀元時代生活史》(1973)與《抗戰時代生活史》(1988)更是為後世留存了一份珍貴的有關民國時期上海生活史與經濟史的記錄，對於探尋鉅變時代的日常生活世界的基本面相較有幫助。

自清末開始，社會名流往往和知識份子高度重疊，他們的回憶錄充分展現了各時代的精神風貌。有關當代中國社會名流交往歷史的回憶錄，吳學昭整理的《聽楊絳談往事》(2008)，著名詩人北島撰寫的有關共和國前三十年北平生活的《城門開》(2010)，趙越勝撰寫的關於周輔成、劉賓雁等人的《燃燈者》(2010)等都較具代表性。趙越勝的歷史書寫將1970年代以降中國精英知識份子的交往、情義、思想與風骨淋漓盡致地展現了出來，從中我們可以管窺1980年代公共文化空間的多元性和開放度，尤其是中國知識份子九死未悔的家國天下情懷。這種歷史書寫不僅僅具有史料價值，而且還具有記錄和反思一個民族的精神史的意義。比如他曾藉講述劉賓雁來評論「良心」與民族的關係④：

人們還常說賓雁是「民族的良心」，我卻對此有些困惑。如果組成民族的個體是背信、貪婪、懦弱、麻木、腐化、自私，那麼這個民族的良心在哪裏？如果一個民族中的個體，心裏充滿了奴隸的恐懼，它讓民族喪失創造力，喪失感受崇高事物的能力，那麼

這個民族的良心是甚麼？如果一個民族中的個體因暴君暫時放鬆了軛套而得到了溫飽的生活，便急忙親吻暴君的手，那麼這個民族又如何去發現它的良心？良心不屬於「民族」這樣一個空洞的集體概念，它只屬於個體。良心的覺醒，良心的發現，良心的堅持，都要由個人承擔。

(五) 普通人

與社會名流相對應的就是庶民或者說底層的歷史，庶民大多是歷史上的失蹤者，他們一般被認為不重要、缺乏歷史書寫的能力，或者缺乏一種保存史料的自覺，而任憑自身的歷史沉沒在時間的暗處。但這些年隨着部分機構的推動，比如「家·春秋口述史計劃」等寫家族史公益計劃、香港中文大學中國研究服務中心「民間歷史檔案庫」，以及中國大陸一些口述史機構的有力推進，遂得以通過各種形式慢慢集聚了有關底層人物歷史命運的記錄⑤。在這樣一個發展過程中，也有普通人視角的自傳引起極為廣泛的社會影響，自然為歷史學家提供了難得的研究庶民階層的第一手史料。比如駱憬甫的回憶錄《浮生手記(1886-1954)：一個平民知識份子的紀實》(2004)對清末親歷科舉考試、參觀1910年「南洋勸業會」、身涉大家庭中遺產紛爭的描述，尤其是對抗戰八年期間一個普通的教師家庭顛沛流離的生活及所見所聞都有詳盡而細緻的記載，從普通人視角觀察中國社會歷史的變遷。而沈博愛的《蹉跎坡舊事：一代中國農人的耕讀夢》(2013)記載了一個生活在湖南鄉村的底層知識份子，在毛澤東時代因為政治運動而遭遇苦難，蒙受了種種艱辛、屈辱而仍舊不屈不撓的生命歷程，可以

說是以個人筆觸、從底層視角記錄了時代鉅變在普通人的人生中所烙下的痕迹。

對於家族和家庭歷史的典範研究，則有美國著名歷史學家周錫瑞 (Joseph W. Esherick) 的《葉：百年動盪中的一個中國家庭》(Ancestral Leaves: A Family Journey through Chinese History, 2011)，將安慶葉家從晚清到共和國時期的家族歷史、成員構成、政治分化和專業認同等放在歷史語境裏做了詳實的分析。葉家五兄弟或者堅持專業技術救國的道路，或者走向革命救國的道路，他們在毛澤東時代的命運更是凸顯了中國這一代知識人的處境、選擇和命運^⑥。

北京大學中文系教授么書儀的《尋常百姓家》(2022) 記錄的是么家——北京一個極其普通的家庭在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作者的同事夏曉虹對這本書的評價很到位^⑦：

么家的家史之所以值得作為一部社會史來閱讀，乃是因為么書儀的父親所具有的工商業者身份。此身份在數十年歷史風雲中的跌宕起伏，在書中都得到了細緻的記述，配以當年的照片、證件以及各種文稿複製件營造的歷史氛圍，真實還原了么家作為一戶普通人家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這一家人不是知識份子、不是名人，正因為其普通，他們的經歷反而更具代表意義。

家族和家庭的記憶也成為近年出版界一個引人矚目的現象，2023 年《新周刊》「刀鋒圖書獎」評為 2022 年度「刀鋒好書」^⑧的《一百年，許多人，許多事：楊苡口述自傳》在歲末年初甫一出版，就引起知識界、傳媒和公眾的廣泛注意。作為著名翻譯家楊

憲益的妹妹、《呼嘯山莊》(Wuthering Heights) 的譯者，楊苡從公共性的立場退到純粹私人記憶的視角，講述其家族的家庭生活，她青年時期在中西女校、西南聯大和中央大學的求學生活，書中充滿了各種細節與場景。那些在光鮮而圓潤的歷史書寫中正襟危坐的歷史人物或者被「粉絲」不斷神化的學者、作家，在日常生活中極其普通甚至滑稽的一面，以一種自然、親切而非戲謔的口吻表達出來。

熊景明《長輩的故事：滇池百年家族往事》(2021) 是由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出版的一本將家族回憶和研究融為一爐的作品，與出身天津楊家這個北方大家族的楊苡的口述自傳正好可以形成南北對照。《長輩的故事》詳述作者祖上和外祖父 (蘇家) 兩個大家族諸多人物的生命和人生悲劇，可謂一部二十世紀中國歷史的多重奏，而在眾聲喧嘩的歷史記憶之中，中國知識人的家國天下情懷始終是貫穿全書的一條主線，這種情懷不是一種空洞的口號和廉價的標籤，而是切實地灌注在這些雲南地方精英的人生、文化生活和政治實踐之中。精英在二十世紀中國的命運毫無疑問是地覆天翻的，在傳統中國，知識精英首先意味着責任心、文化傳承和以天下為己任的擔當；而到了民國，精英的內涵增加了非常重要的一個面向，即基於現代科學發展出來的專業技術能力，也就是用專業和科學的方式投身現代中國的建設。毫無疑問，熊、蘇兩大家族在清末民初的轉型過程，生動而深刻地體現了士大夫群體並非像此前教科書和公共輿論所描述的因循守舊、一味復古的刻板形象，而是能夠在轉型時代主動接觸新思想、新觀念和新文化甚至新的生活方式，進而在西南邊陲的地域社會開風氣之先。

二 以主題區分

以回憶錄的主題來區分，我們可以大致按照革命中國的革命記憶、政治運動、離散、戒嚴時期與集體記憶等主題來劃分回憶錄的類別。

(一) 革命記憶

就革命歷史記憶而言，比較值得重視的就是由北京東方出版社於2004年印行的「現代稀見史料書系」，包括張國燾《我的回憶》(1971-1974)、王凡西《雙山回憶錄》(1977)、陳公博《苦笑錄》(1979)、鄭超麟《回憶錄》(1986)等。這套史料將二十世紀中國革命史上的「異端」(比如托派〔托洛茨基主義派〕)、失蹤者(尤其是在中共黨內鬥爭中失敗的人士)的歷史命運與思想境況展現出來，這就有利於從一個更全面、豐富的視角去探測二十世紀中國革命的全貌。

與此相關的還有中共資深人士何方的《從延安一路走來：何方自述》(2007)、托派成員彭述之妻子陳碧蘭的回憶錄《早期中共與托派：我的革命生涯回憶》(2010)、任均的《我這九十年(1920-2010)：一段革命家庭的私人記憶》(2010)、陶鑄夫人撰寫的《百戰歸來認此身：曾志回憶錄》(2011)。其中《微覺此生未整人：曾彥修訪談錄》(2011)以口述訪談的方式細密而完整地記述了四川地方青年曾彥修參與中共革命並見證延安整風、國共內戰、毛時代一系列政治運動的過程，呈現了文化界、出版界從業人員在中共革命政治下的處境與命運。有關中共革命的回憶錄不勝枚舉，但這裏所列舉的是相對比較中肯客觀的，即使是何方等黨內人士，對於革命歷史也有相當公允公道的評價，因此更值得史學研究者注意。

(二) 政治運動

近些年涉及到1950年代以後思想改造運動、反右運動和文化大革命的回憶錄的出版比較惹人注目，呈現為一種文化現象。阿倫特(Hannah Arendt)說過：「除非經由記憶之路，人不能達到縱深。」^⑨二十世紀中國人經歷了巨大的痛苦與磨難，而知識份子群體更是各種政治運動的被捲入者、犧牲者和見證人，正如巫寧坤所言：「我歸來，我受難，我倖存。」^⑩這幾乎成了有「獨立之精神」和「自由之思想」的知識份子的命運三部曲。知識份子二十世紀中國革命最真誠的參與者和推動者，同時又是最創深痛鉅、遭受深度懷疑和折磨的群體。趙園在研究知識份子與文革的力作中一針見血地指出^⑪：

對待知識的功利主義態度，與對待知識份子的功利主義(「利用」)一致。自然科學為經濟建設服務，成效立見，而以官方意識形態整合人文社會科學，幾乎是不可能的任務。人文社會科學不止關係學術，且關涉價值觀、道德立場以至信仰，難以為意識形態所規範，不能不令當局忌憚。陳寅恪所說「獨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尤其是人文社會科學發展的必要條件。在最高領袖的一句話可以決定一個學科存廢的條件下，人文社會科學的發展是無望的。當然，人文社會科學是否發展，或被認為無關緊要。

部分政治運動親歷者的回憶錄，將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的中國革命的另一面呈現出來，比如暴力的、血腥的、幽暗的、恐怖的面相。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有美學家高爾泰記述其在中國右派的「地獄」——夾邊溝的個人

記憶與心靈史的《尋找家園》(2004)，為經歷了那個黑暗時代的知識人的歷史世界與心智生命留下了一份永恆的見證。這本書也翻譯為英文出版^⑫，據高爾泰記述，翻譯過程一波三折，此前的美國大牌譯者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試圖將浸透着作者個人記憶和嚴肅反思的《尋找家園》改頭換面，翻譯成美國讀者所熟悉且認同的校園成長故事(比如打架、逃學、留級之類似乎「有趣」的故事)，高爾泰毅然撤稿，並講述其寫作回憶錄的深層動機：「我們沒有受難者紀念碑，我們的『文革』和歷次政治運動沒有遺址。只剩下幾個倖存者星星點點的記憶，在烈風中飄零四散。保存不易，憶述更難。流亡中寫作，字字艱辛。竟被如此糟蹋，說驚訝已太溫和。」^⑬

作家邵燕祥在其回憶錄《我死過，我倖存，我作證》(2016)中如此自述其撰寫的動機：「歷經憂患的生還者也都逐漸老去，這就是我為甚麼如此急切地寫出來，獻給健在者和一切敢於直面歷史的同時代人，只有他們有權利來審查這一份歷史的見證。」^⑭電影導演彭小蓮為其父輩和家庭撰寫的作品《他們的歲月》(2000)，以一種電影素描的方式呈現了其父親彭柏山、母親朱微明在毛時代經歷的苦難，講述革命如何吞噬它自己的兒女的悲劇故事，特別讓人為之動容。另外，巫寧坤的回憶錄《一滴淚》(2002)與其女兒巫一毛的回憶錄《暴風雨中一羽毛：動亂中失去的童年》(2007)，從家庭、性別、城鄉、教育等視角呈現了一系列的政治運動對於個人日常生活和精神世界的巨大影響，展現了革命進程對於弱者、邊緣人物和知識份子的無情壓抑和迫害。

此外，楊小凱(楊曦光)的《牛鬼蛇神錄：文革囚禁中的精靈》(1994)、季

羨林的《牛棚雜憶》(1998)、徐幹生的《復歸的素人：文字中的人生》(2010)等回憶錄將知識份子被限制自由、強迫勞動的境況，被關押牢獄的處境，以及在地方、城市面臨紅衛兵羞辱和迫害的歷史都記錄在案。尤其是徐幹生對於紅衛兵運動過程中所形成的符號暴力文化與集體心態的分析，可以幫助史學研究者從一個更深刻的視角來探究紅衛兵暴力文化是如何自我證成或自我正當化的。

從某種意義而言，知識份子對於苦難歷史的書寫，除了搶救記憶和保存真相的意圖之外，也是構建知識群體自我認同和重建知識人尊嚴的一種方式。訴苦或控訴不是目的，超越個人悲情而抵達更高層次的歷史反思和群體認同才是更有價值的目標。對於苦難的書寫也並不是為了製造隔閡和煽動仇恨，而是指向更高意義上的寬恕與和解；正因如此，個體的苦難必須能夠進入一個公共性的文化空間來自由自主地表達和呈現出來。正如阿倫特所言：「如果不是寬恕讓我們擺脫我們所做事情的後果，我們的行動能力就會被束縛在一個我們永遠無法補救的單個行為上；我們就永遠是其後果的犧牲品，像沒有咒語就不能打破魔咒的新手魔法師一樣。……只有通過他人的在場(他人確保了作出承諾的人和實現承諾的人是同一個人)，讓公共領域的光芒投射下來，黑暗才能被驅散。」^⑮

(三) 離散

二十世紀中國的前半葉對於中國人而言是充滿了悲劇性的歷史時期，而伴隨着兩岸分治體制的確立和冷戰時代的到來，無論是社會名流還是普通人的生活世界都被割斷成不同的區域。因此，戰亂、逃難、離散與

苦難，等等，就成為回憶錄寫作中極為突出的主題。而在這類回憶錄中最引人矚目的有旅美華人作家王鼎鈞的「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1992-2009)，尤其是第三部《關山奪路》(2005)堪稱對1945至1949年間國共政爭與軍事衝突等的最好見證，通過對兩黨控制下的軍隊文化、組織效力、黨與社會的關係、戰後國民黨對日治區域的接收等各方面的記述與考察，王鼎鈞令人信服地闡釋了國共兩黨強弱轉化之道；第四部《文學江湖》(2009)則生動而細緻地記錄了戒嚴時期的台灣政治生活、傳媒與社會文化史。王鼎鈞撰寫回憶錄的方式跟做歷史研究一樣極為嚴謹周密，他曾經在日記裏如此講述其寫作《關山奪路》的經過與目標^⑥：

為了喚起回憶，核對人名地名時間，查出有關數字，我買了大約五百本書，約一百本與內戰有關，另外每周至少一天去「坐」哥倫比亞大學的東方圖書館，並且向中國大陸搜尋倖存的關係人，與他們通信。找資料像酒癮煙癮，總要超過「必要」才愉快，想像學人治學大抵如是。我好像置身內戰之中，重新經歷大勢和細節，但是此時無利害，無恩怨，無是非，無禍福，也就沒有苦樂。只有這樣，我才能夠寫下去，而且跳出俗套。我已撤除一切障蔽，也不樹立新的障蔽，不受前人欺，也不欺後人。

台灣大學退休教授齊邦媛的《巨流河》(2009)在兩岸三地甚至整個華文世界也引起巨大的文化影響。作為東北政治精英齊世英的女兒，齊邦媛描述其家族、家庭和個人在歷史與政治的鉅變中所體驗和觀察到的中國，包括其求學於武漢大學、任職於台灣

一些學校的經歷。回憶錄較大的意義之一，也許是用個人化的風格闡釋了即使在極為混亂、焦慮和不安的中國，面對外部世界的動盪與衝突，一個知識人仍舊可以葆有讀書人的文化氣味與智性尊嚴。此外，《巨流河》對於研究民國時期中山中學、南開中學和武漢大學等學校與社會、政治等的互動也頗有參考價值。《巨流河》書寫的其實就是中國的知識精英在天地玄黃的二十世紀的離散歷史，從城市到鄉村、從沿海到內地、從上層到底層、從大陸到港台的離散，而抗戰前在平津等地凝聚起來的知識份子精英文化也因而如弱草棲塵花果飄零，背後還蘊含着無數普通家庭的成員因為政治和戰爭等而導致的生離死別的離散。儘管面對如此至暗的歷史時刻，更難能可貴的是齊邦媛在書中所傳遞的人生觀與價值觀對於華人世界也有着長久的滋養心靈的作用，正如她在該書出版後接受青年學者明鳳英的訪問時所言：「我的人生原則是，不抱怨，不訴苦，自己的人生不需要不斷地向別人解釋，這樣太辛苦了，也沒有具體的意義。不論在甚麼環境裏，我都會竭盡所能，毫不抱怨地把事情做好。只要自己了解自己的選擇，無愧於心才是最重要的。」^⑦

(四) 戒嚴時期

1949年，播遷台灣的國民政府實行戒嚴體制，全面整肅政治異議份子尤其是左翼知識人。王鼎鈞在回憶冷戰時期台灣的《文學江湖》如此描述外省人心態^⑧：

多年以後，我在海外對一位台灣本土生長的官員說，當年你們只作一種惡夢，我們作兩種惡夢，我們的恐怖是雙料的，你們的恐怖縮了水。你們只

怕蔣介石，不怕毛澤東，你們不知道毛澤東更可怕，你們到底比我們幸福。你們的問題比較簡單，也許認為只要推翻蔣介石就可以了，我們不行，我們有人怕他，有人恨他，大家還得保着他，兩害取其輕，靠他抵抗共產黨。我們惟一的交代是保他才可以保台，但是台灣不領這個情，我們勞碌一生，也許三面不是人。他聽了哈哈大笑。

旅美作家聶華苓的自傳《三生三世》(2004)記述其在《自由中國》雜誌擔任編輯時所接觸的殷海光、雷震、夏道平等冷戰時期台灣獨立知識人，展現了面對威權主義的政治壓力時，知識份子是如何試圖守護其文化與思想的尊嚴的。此外，像《番薯人的故事：張光直早年生活自述》(1999)、鄭鴻生的《青春之歌：追憶1970年代台灣左翼青年的一段如火年華》(2001)、旅美學界孫康宜的《走出白色恐怖》(2003)、尉天驄的《回首我們的時代》(2011)、藍博洲的《台共黨人的悲歌：張志忠、季滙與楊揚》(2012)、《無悔：陳明忠回憶錄》(2014)等，都對了解1950至80年代的台灣政治與社會文化轉型很有價值。

我曾經在關於《走出白色恐怖》的書評裏特別指出，孫康宜在回憶過去的苦難時與很多大陸知識人的歷史記憶有迥然有別之處：「孫康宜的《走出白色恐怖》，在所有關於極權主義時代的回憶錄作品中，顯然是獨具一格的，書名就隱含了作者寫作的深層動因，那就是不再糾纏於歷史的恩怨與清算，而是通過追述個人、家庭或群體在政治壓迫時代的生命故事，來展現即使在最黑暗的年代，人性仍然會有一線幽光在閃爍。」¹⁹而錢鍾書在為楊絳的《幹校六記》所寫的〈小引〉

裏歸納了經歷過毛時代的政治運動之後讀書人不同的心態²⁰：

現在事過境遷，也可以說水落石出。在這次運動裏，如同在歷次運動裏，少不了有三類人。假如要寫回憶的話，當時在運動裏受冤枉、挨批鬥的同志們也許會來一篇《記屈》或《記憤》。至於一般群眾呢？回憶時大約都得寫《記愧》：或者慚愧自己是糊塗蟲，沒看清「假案」、「錯案」，一味隨着大夥兒去糟蹋一些好人；或者（就像我本人）慚愧自己是懦怯鬼，覺得這裏面有冤屈，卻沒有膽氣出頭抗議，至多只敢對運動不很積極參加。也有一種人，他們明知道這是一團亂蓬蓬的葛藤，但依然充當旗手、鼓手、打手，去大判「葫蘆案」。按道理說，這類人最應當「記愧」。不過，他們很可能既不記憶在心，也無愧怍於心。

我們在季羨林的《牛棚雜憶》、周一良的《畢竟是書生》(1998)等學人的回憶錄裏可以充分感受到錢鍾書所針砭的這些「記憶的倫理」。現代中國的知識人多的是家國天下情懷的憂患意識，少的是正視自身人性黑暗的幽暗意識²¹。相對而言，大陸知識人就自身人性的幽暗來進行深切歷史反思的較為罕見，反思往往是指向歷史、政治或他者的，即使是極其有限的一些反思性的歷史記憶，也表達得極為隱晦。比如曾經擔任《讀書》雜誌主編的馮亦代在晚年所作的回憶錄《悔餘日錄》(2000)幾乎是用一套暗語和隱語，對反右運動後在知識份子家庭中充當「坐探」的經歷進行追憶和反思，後來當事人章詒和據此寫下〈臥底〉一文，引起軒然大波和持久的爭議，引申出來的一個核心問題是：根據當時的歷史情境定期向組織

報告朋友、同事或家人的情況、心情等，是否屬揭發和告密？政治運動是否摧毀了最基本的私人倫理^②？

(五) 集體記憶

集體記憶也是回憶錄寫作與出版中一個值得注意的文化現象，此處的集體記憶是指曾經處於特定時代或特定歷史中的同一個共同體裏的各個成員，從特定的視角與經驗出發所展開的歷史書寫，這種歷史記憶的形式往往有助於將歷史的多元性與複雜性呈現出來，既是一個知識群體構建身份認同和自我確診的方式，同時也表徵着對於權力和社會系統性壓迫的一種「弱者的抵抗」。記憶研究專家阿斯曼 (Jan Assmann) 曾經指出：「在極權主義的大一統中，回憶提供了另外一種可能性，使人們可以獲得對他者的經驗、得以與當下和現實中的專制制度保持距離，從更普遍的、不那麼政治化的角度來看，回憶是與某些壓力的對抗，這種壓力包括：日常生活對社會現實所施加的壓力、愈來愈趨向於標準化、『一元性』和降低複雜性的壓力。」^③

比如北島、曹一凡、維一主編的《暴風雨的記憶：1965-1970年的北京四中》(2011) 收錄了陳凱歌、秦曉、印紅標、劉東、唐曉峰等人對文革時期以高幹子弟為主的北京四中在紅衛兵運動興起的作用、角色，內部的派系、暴力，以及各自與高層政治的互動的記述，尤其是關於北京四中究竟是否發生針對教師的直接暴力的各執一詞的記憶，呈現了紅衛兵運動極為複雜的面相。而由北島和李陀主編的《七十年代》(2008) 收錄了阿城、韓少功、王安憶、閻連科、陳丹青等知名作家以及李零、趙越勝、蔡翔、唐曉峰等學者關於1970年代中國的回

憶，包括政治史、社會文化史、閱讀史、生活史等各個方面的內容，對於了解70年代中國在強硬的主流意識形態之下民間思潮的勃興與散布有較高的史料價值。此外，馮驥才的《一百個人的十年》(1987)、查建英的《八十年代訪談錄》(2006)、李懷宇的《訪問歷史：三十位中國知識人的笑聲淚影》(2007) 等涉及毛時代和改革開放時期的中國社會的方方面面；馮驥才的著作側重於普通人的歷史，而查建英和李懷宇的專書側重於透過與知識精英的訪談來呈現其記憶中的中國歷史。

台灣方面出版的比較有價值的是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主持出版的《蔣中正總統侍從人員訪問紀錄》(2013)，通過對曾在蔣介石身邊工作的各種層級人員的訪問，呈現了蔣介石與他的時代各個層面的歷史；《近史所一甲子：同仁憶往錄》(2015) 輯錄了對於王爾敏、張玉法、張朋園、黃福慶、呂芳上等台灣歷史學者的深度訪談，重構了他們求學、治學、育人和訪學交流的過程，對於了解第二次世界大戰後台灣學術界的歷史和經驗極有裨益。

三 結語

法國思想家托克維爾 (Alexis de Tocqueville) 說過：「當過去不再照耀未來，人類的心靈就會在茫然中遊盪。」^④ 當代中國回憶錄的撰寫、出版、傳播與閱讀，其實也就是在建構一個介於歷史與當下之間的記憶通道，將歷史文化資源引入到當代中國的史學研究領域與公共文化空間。從這個角度來看，回憶錄不僅僅是尋求自我認同與文化認同的歷史寫作，同

時也是試圖澄清瀰漫在意識形態迷霧中的二十世紀中國歷史記憶的一種文化自覺和歷史意識。自然地，並非所有的回憶錄都是完全可信的，寫作者基於不同的視角、立場、資源和意圖等出發的對於過往的追憶，往往在凸顯一種史實的同時遮蔽了另一種史實，也可能強化了某種歷史認知框架或淡化了另一種歷史認知與想像。黨史專家王海光曾經專門就回憶錄的史料價值辨析問題撰文指出^⑤：

平心而論，各種各樣的回憶錄，多少都會有當事人自我合理化的成份在裏面。這種自我合理化的要求，是人性使然。人們對曾經歷過的尷尬事，為擺脫懊惱和懺悔的長期煎熬，求得心裏的安寧，是需要對自己的行為有一個相對合理性的解釋的。差別僅僅在於，這種自我合理化產生的撰述誤區，是有意為之，還是無心為之。有意為之，長此以往的自我蒙蔽，就會把謊言當作事實。無心為之，能夠在事實面前保持住一份自我反省的清醒，能夠在真假美醜的邊界上把持住是非曲直的道德底線。所以在存史中出現誤差時，兩者的態度判若雲泥。

撰寫回憶錄，是一項恢復歷史記憶的工作，需要對歷史負責，不能虛飾，不能挾私。不僅需要有實事求是地審視自己和審視他人的客觀態度，還需要借助當時的日記、筆記和文件等原始資料恢復歷史的記憶，特別是需要有其他歷史當事人的交流、印證和相互補充。

只要回憶錄的寫作、出版與交流保持足夠的多元與開放，歷史記憶與歷史寫作就有可能逐漸抵達歷史的真實，從而為發源於歷史的公共討論與學術

研究提供一種基礎。對於二十世紀中國的歷史記憶的學術目標和知識責任而言，也同樣如此。

註釋

① 王明珂：〈誰的歷史：自傳、傳記與口述歷史的社會記憶本質〉，載定宜莊、汪潤主編：《口述史讀本》（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1），頁78-79。

② 羅新：〈遺忘的競爭〉，載《有所不為的反叛者：批判、懷疑與想像力》（上海：三聯書店，2019），頁29-30。

③ 比如唐啟華：《巴黎和會與中國外交》（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鄧野：《巴黎和會與北京政府的內外博弈：1919年中國的外交爭執與政派利益》（北京：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14）均採用了回憶錄作為史料。

④ 趙越勝：《燃燈者》（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0），頁167。

⑤ 〈中國研究服務中心特藏〉，香港中文大學圖書館網，www.lib.cuhk.edu.hk/tc/collections/spc/usc-collections；〈對這些90後來說，親自調查家族史比讀歷史書有勁〉（2014年12月18日），澎湃新聞網，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1286620。

⑥ 同樣出身葉家的馬薩諸塞州州立大學波士頓分校歷史系退休教授葉維麗曾經在書評中對周書做出肯定，之後也有商榷：「周書也有不盡如人意處，使我感到像是以西方的中國研究為腳本，拿葉家的人和事做illustration。怎麼來恰當地翻譯illustration呢？這裏我自造個詞：『人註』。在書中多處，葉家人被作為『人註』，來闡釋和『圖解』美國學者的研究。書中寫到多起中國近現代史上的重大事件，葉家人也身在其中，而缺乏對他們的思想理念、精神追求、內心世界的挖掘，缺乏對他們作為主體性的人的把握，這個缺欠在涉及我父輩那代人時比較明顯。」參見葉維麗：〈我心目中的葉氏南開五兄弟〉（2014年8月24日），網易新聞網，www.163.com/news/article/A4DGRUDV00014AED.html。

⑦ 夏曉虹：〈家史、社會史與精神史——讀么書儀《尋常百姓家》〉，《北京日報》，2022年12月6日，第10版。

⑧ 〈傾聽「眾聲與獨白」，2022年度刀鋒圖書獎在杭揭曉〉（2023年4月16日），澎湃新聞網，www.the-paper.cn/newsDetail_forward_22725480。

⑨ 阿倫特（Hannah Arendt）：〈何為權威？〉，載王寅麗、張立立譯：《過去與未來之間》（南京：譯林出版社，2011），頁89。

⑩ 巫寧坤：《一滴淚》（台北：遠景出版事業有限公司，2002），頁7。

⑪ 趙園：《非常年代（1964-1978）》，下篇（香港：牛津大學出版社，2019），頁809-10。

⑫ Er Tai Gao, *In Search of My Homeland: A Memoir of a Chinese Labor Camp*, trans. Robert Dorsett and David Pollard (New York: Ecco Press, 2009).

⑬ 高爾泰：〈文盲的悲哀〉，載《草色連雲》（北京：中信出版社，2014），頁97。

⑭ 邵燕祥：〈我死過，我倖存，我作證〉（北京：作家出版社，2016），頁1。

⑮ 阿倫特著，王寅麗譯：《人的境況》（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頁184-85。

⑯ 王鼎鈞：《水流過，星月留下：王鼎鈞紐約日記（1996年4月—1997年11月）》（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14），頁152-53。

⑰ 齊邦媛：〈潭深無波《巨流河》〉，《東方早報》，2013年3月15日，B01版。

⑱ 王鼎鈞：《文學江湖：王鼎鈞回憶錄四部曲之四》（台北：爾雅出版社，2009），頁147。

⑲ 唐小兵：〈超越訴苦的歷史記憶〉，《南方周末》，2012年9月27日，E24版。

⑳ 錢鍾書：〈小引〉，載楊絳：《幹校六記》（北京：三聯書店，1981），頁1-2。

㉑ 張灝先生曾對此有過深刻的界定：「所謂幽暗意識是發自對人性中與宇宙中與始俱來的種種黑暗勢力的正視和省悟：因為這些黑暗勢

力根深蒂固，這個世界才有缺陷，才不能圓滿，而人的生命才有種種的醜惡，種種的遺憾。」他也曾在崔衛平的訪問中闡述過憂患意識和幽暗意識的異同：「『憂患意識』是感覺到周圍世界出了嚴重問題，危機四伏，因此產生一種憂懼與警覺感。因此，憂患意識認為人的憂患，人世的陰暗主要來自外界，而人的內心卻是我們得救的資源。發揮人的內在『心力』，可以克服外在的困難，消弭憂患。幽暗意識不一樣。它提醒我們要結合人性、人心內部的缺陷來看待外部世界的問題，就着人性作一個徹底的反思。很多看起來是外部的災難，正是由人本身、人性中的缺陷、墮落所造成，人可以提高自己的人格，但歸根結蒂，那是有限的。與之相反，人的墮落卻可以是無限的。對於人性中幽暗的這一面，必須要有十分的警覺。」詳見張灝：〈幽暗意識與民主傳統〉、崔衛平：〈人最大的敵人是人自己——張灝訪談〉，載任鋒編校：《轉型時代與幽暗意識：張灝自選集》（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頁43、360。

㉒ 章詒和：〈臥底〉，《南方周末》，2009年4月2日，第24版。我曾經在一篇專欄文章〈政治與人情的雙重奏〉（《東方早報》，2012年2月7日，B10版）裏討論過「革命以情感與暴力交疊使用的方式在最大程度地摧折政治中的人情」這個問題。

㉓ 阿斯曼（Jan Assmann）著，金壽福、黃曉晨譯：《文化記憶：早期高級文化中的文字、回憶和政治身份》（北京：北京大學出版社，2015），頁84。

㉔ Alexis de Tocqueville, *Democracy in America*, ed. Eduardo Nolla, trans. James T. Schleifer, vol. 2 (Indianapolis, IN: Liberty Fund, 2012), 1278.

㉕ 王海光：〈回憶錄的寫作和當代人的存史責任〉，《炎黃春秋》，2007年第5期，頁61。